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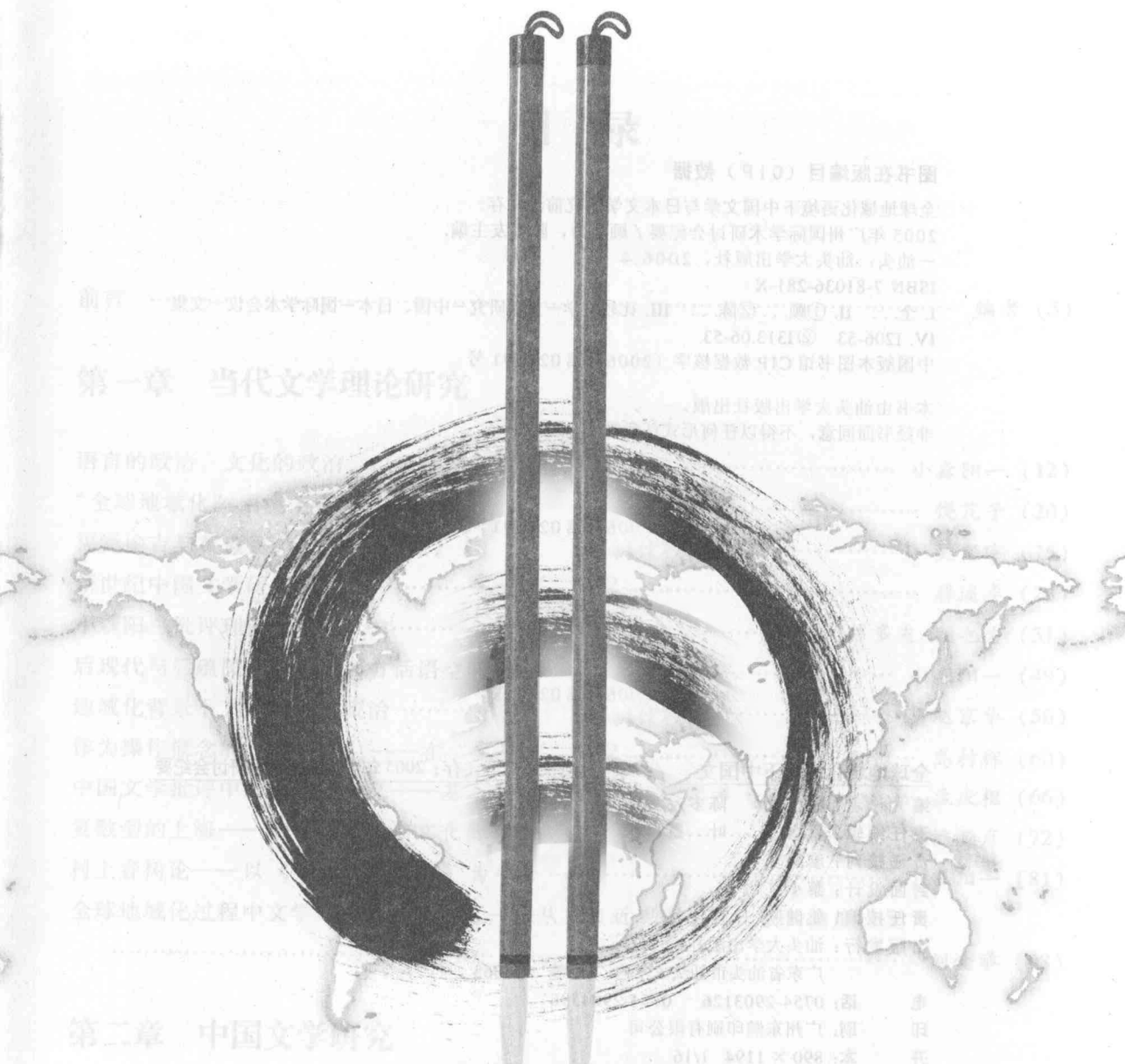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 前沿文存(一)

2005年广州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顾也力 陈多友◎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 前沿文存(一)

2005年广州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顾也力 陈多友◎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

2005年广州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顾也力,陈多友主编.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81036-281-X

I. 全... II. ①顾... ②陈...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日本—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206.53 ②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8591号

本书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2005年广州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编者:顾也力 陈多友

责任编辑:蒋惠敏 叶 慧

责任校对:廖醒梦

封面设计:黎小红

责任技编: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广州东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194 1/16

印 张:18.5

字 数:330千字

版 次:2006年4月第1版

印 数: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次:1500册

定 价:30.00元

ISBN 7-81036-281-X/I·164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3004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22232999 传真/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3833 传真/603-90562833

E-mail: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前言	编者 (5)
----------	--------

第一章 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语言的政治,文化的政治,以及文学的政治	小森阳一 (12)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研究之思	饶芃子 (20)
福泽谕吉与黄遵宪:《文明论概略》与《日本国志》比较	吴定宇 (25)
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态势	蒋述卓 (28)
小森阳一批评理论之管见	陈多友/顾也力 (31)
后现代与后殖民:当代东西方话语空间的历史性展开	小森阳一 (49)
地域化背景下文学批评的政治	赵京华 (56)
作为操作概念的“地域化”——在“东亚”语境中的考察	岛村辉 (60)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后现代主义——基于全球本土化语境的思考	孟庆枢 (66)
复数型的上海——论把握沦陷期文化的多元视角	大桥毅彦 (72)
村上春树论——以《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心	小森阳一 (81)
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文学研究的几点误区——从中日近现代小说比较的角度出发	刘金举 (98)

第二章 中国文学研究

刍议《边城》的文化特质	顾也力/陈多友 (106)
论穆时英小说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陈伟华 (112)
如何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学革新史上的作用与意义	谢文新/陈多友 (1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丁玲研究	王兰 (126)
试论梁启超的“群治”思想——兼谈《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陈多友 (132)
被上海化的男人	大桥毅彦 (145)

第三章 日本文学研究

浮游城市——评横光利一《上海》	仓数茂 (148)
-----------------------	-----------

日本中世隐者文学源流初探	丁国旗 (150)
“从边缘出发,到边缘去”——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民间文化	兰立亮 (158)
刍议文学人类学新思考——兼谈《挪威的森林》与“小资女人”	孙洁 (164)
试论日本中世和歌的“幽玄”之境	李东军 (169)
试论前《古今集》时代恋歌之特征——以恋歌中“第二人称人称代词”为主线	李沛 (174)
日本神话“天照大神”形象初探	蔡艳艳 (181)
《蛇性之淫》中蛇意象之文化读解——与日本“道成寺传说”中蛇意象的比较	徐磊 (186)
《沙女》中对人类生存状态和自我救赎的思考——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出发	许静华 (191)
岛尾敏雄及其小说创作	贾秀梅 (198)
从女权主义看渡边淳一的恋爱小说的女性观——以《一片雪》《化妆》为中心	李玮凌 (203)
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	张小玲 (210)
穿越国界的《望乡》	刘燕 (215)
从宫泽贤治的多重身份来看其童话作品	崔莉 (222)
浅谈对日本中世文学的认识——以《新古今和歌集》的成立为中心	钟俊梅 (225)
管窥日本中世文学中的无常观	吴丽霞 (228)

第四章 比较文学研究

试论白桦派文学对周氏兄弟等的影响	陈多友/顾也力 (232)
试论“境界论”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	谭冰/陈多友 (239)
讽刺与游乐——《金瓶梅》与《好色一代男》的比较	杨曼 (247)
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李清照与清少纳言	寿舒舒 (253)
关于台湾新文学运动以前旧文学的考察——兼与日本近代文学比较	蔡爱芬 (260)
《边城》与《伊豆的舞女》——人物塑造、小说主题及艺术风格之比较	吴梦 (270)
《莽丛中》与《报恩记》的比较研究	王瑜 (275)

第五章 译介学及其他研究

浅谈翻译中的误读——关于日汉翻译中误译现象的两点思考	张秀强 (281)
汉语古文词在现代日语中的残留	关孝才 (287)

附录 用卡西欧译天下电子辞典轻松学日语	(292)
---------------------------	-------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的亚洲主义思考

——写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出版之际

正如我国跨文化研究学者徐真华所指出的那样：“20 世纪 90 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与之相伴生的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全球化浪潮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这种潮流也深刻地影响到学术层面，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化’语境。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概括地说，在文学研究领域，东亚的研究者、学者普遍感到‘阐释忧虑’、‘失语’以及‘身份认同’之困惑。这种现象极不利于研究的开展。所幸的是：‘9·11’事件发生以后，一种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新思潮——即‘全球地域化’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涌动；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在东亚，‘10+3’理念主导下的‘东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正在蓬勃地展开。”（引自徐真华 2005 年 3 月 26 日在题为“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的新路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本文下述行文中所引述的相关学说、见解皆为相关学者在本次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或书面发言中所涉及的内容——编者注）

在如斯情势下，东亚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协同作业、共建话语、明确身份的重要性。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学者、研究者已经积极有效地展开了交流与协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及时总结这些成果，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地域化’语境下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显得十分有必要。有鉴于此，2005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的新路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日本国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女子美术大学、札幌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等国内外四十余所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规格甚高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日两国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东亚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新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可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基本上肯定了“全球地域化”思潮的存在，明确了其基本内涵以及对“全球化”所具有的解构作用。饶芃子基调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全球地域化”思潮发生的事实。她认为，20 世纪后半叶，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转型期，其标志是：欧洲中心论动摇，多元文化崛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体系和中心都是相对的，一个文化体系要发展，必须从另外的文化体系寻求参照。这就形成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文化外求，横向开拓。在这种形势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形式主动与“第三世界”的学者合作，表现出一种在文化差异中求和谐的愿望。突出的例子如欧洲的“双向文化人类学派”，他们于 1987 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一届跨文化国际研讨会之后，专门邀请非欧洲学者去欧洲实地考察和评点欧洲文化，而且主要是邀请亚洲学者。他们认为：“文化沟通是一种相互认识和承认的过程。”

既然“全球地域化”作为一种现实的文化思潮已经出现，并事实上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去面对的问题。就此有不少学者不无忧虑。赵京华就发出

警示：“在思考全球地域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时，首先应该清楚‘地域化’这个成为时下人们关注的话语叙述的产生背景即‘全球化’。”他指出：20世纪后期，随着殖民主义的退出历史舞台和阻碍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一个以信息革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与文化广泛交流互动的时代潮流已经势不可挡。近几十年来，我们亲身经历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员、资本、信息、技术和物流迅速而广泛的移动，也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和对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强烈冲击。对此，人们或者庆幸一个摆脱了政治力量的限制和束缚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全面解放与发展时代的到来，或者忧虑于民族国家制度下的主权和国界正在遭到挑战而走向衰弱。然而更主要的事实是，没有哪一个地区和国家能够超然于这个“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之外。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盛行于日本社会的“国际化”口号和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的“与国际经济接轨”战略，都是应对全球化潮流所作出的看似积极而实为不得已为之的方策。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前后，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化”实乃冷战结束后新的超级帝国（美国为中心）以金融资本乃至军事实力来重新“划分”和掠夺世界财富，其中包含着一种更加隐蔽更为广泛的经济与文化殖民主义。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新帝国的理论家如何赞美“全球化”和“历史的终结”，90年代以来的世界不是变得更和平美好，相反是南北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因此，与“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地域化”，也就成为一种新的必然趋势。

小森阳一基本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在许多激进思想家看来，某些全球性危机极有可能引发这样的变化，比如，一场严峻的金融冲击、经济衰退、战争、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扩大，或是生态灾难，从而致使现行的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地应付。在这种情形下，比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更为进步的规划和选择也许可以获得战略影响，但这必须依赖于全球社会力量的特殊的历史组合。既然经济危机和贫困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地方性病症，正如所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都潜藏着地方性病症那样，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就内在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的联合体的矛盾中。根据这样的逻辑推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就其当前的形式来说最终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其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断产生政治对抗性的反应。有学者指出，正是占优势的秩序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成为变革的发动机，或许最终改变甚至摧毁这个体系，开辟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无庸讳言，他这里所说的“后全球化时代”指的就是“全球地域化”。可见，小森阳一的持论恰好为赵京华的见解做了注脚。王宁从另外的角度指出了“全球地域化”的现实性与历史必然性。他说：“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地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随之也出现了其第二个方向，也即全球化的渗透，从中心向边缘运动，同时也导致了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双向运动。所以它的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也即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或者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是一种‘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的策略，也即与全球化逆向相悖的另一个过程，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后殖民批评理论几经周折仍在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这说明，原先的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进行抗争，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向强势文化的反渗透提供了契机。”

顾也力认为：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预测的那样，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会向着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尤其是东亚或者说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地位会得到大幅度的

提升,该地区各国以及地区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文明传统,加之地缘政治学等因素使然,他们在国家利益诸如政治稳定、军事防卫、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诉求。因此,面对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老牌殖民主义集团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他们有着同样的文化防卫心理,于是他们必然会在反观历史的基础上,本着屈从和谐、共生共荣的务实精神,结成类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域性集团,以有效地对抗“全球化”带来的侵扰。

岛村辉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明确地将东亚的全球地域化问题置换为“东亚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他指出:今后,以“中日”、“东北亚”、“东亚”为象征的地域合作无疑将会加深。他援引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日中关系的改善”这一问题的作答,大胆预测在中日之间,历史认识将会成为一个大焦点。他认为:现在,不仅仅要从两国之间的问题出发,也要从“东北亚”、“东亚”的地域问题出发,来寻求“中日”历史的思考视点。现在,寻求“中日”历史的思考视点,不仅仅是两国间的问题,也是“东北亚”、“东亚”的地域问题。

陈多友显然更为关切“亚洲主义”这一历史命题的现实本土意义。他认为:如果能够从亚洲主义的高度正面看待历史问题,相信中日之间、东亚各国之间乃至整个亚洲都会形成共同的言说语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与合作。而且这种对话与合作还不只是文化层面的,在经济层面也可以实现共生、双赢。毕竟中国同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展阶段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文化上关系密切,而且在经济发展方面保持着强烈的互补性。尤其是与日本之间。近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正在增加,但其出口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与日本的竞争并不激烈。认清了中日两国经济是处于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双方而言应当是双赢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为日本出口增长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给日本经济创造更大的市场,促进中日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他乐观地预测:中日两国的经济共生、共荣,势必促成文明内部的建设性对话,加之政治、外交层面的磨合、协调,两个伟大的民族最终会以东亚地区领袖的豁达心态携起手来,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整合地域性资源,建立平滑、宽松的文化空间。“10+3”构想就是其初步形态。

可见,中日学者就“全球地域化”的现实性与本质所持的看法或表现出来的关切心理是相近的。

其次,众声喧哗、各自表述,体现出中日学者面对“全球地域化”这一时代命题之际的复杂却丰富的思考。

小森阳一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西方当代思潮,其实质是语言学的问题。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这样的重大转换其实是19世纪到20世纪语言学对于自身是什么样的体系的关注,是对语言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文化结构,即对文化与语言之间关系的关注,也就是关注语言体系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要分析语言系统的结构,就要把握在后现代到后殖民的具体环境中,在怎样的力量对比中谁对谁、因何现实意图说了怎样的话语、这种话语在现实社会 and 生活中如何发挥它的权利机能、形成了怎样的影响、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怎样的结果,诸如这样的思维方式转换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方可以立刻作出判断,语言的方式、语言机能的方式以及语言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力量对比,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是有好的影响抑或仅仅是危害?且作出如此判断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的一种责任。因此他指出:“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思潮,我们应该保持冷眼看世界的姿态,时刻进行着理性的思考与研究;伴随着全球地域化思潮的高歌猛进,我们更应该树立起广阔的亚洲主义主体意识;我期待着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同行们能够共同肩负起建立主体的任务。”

相形之下,王宁的态度则倾向于调和主义。他指出:全球化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人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是西方的,

而且在欧洲人看来却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向其他地区的渗透。因此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在抵制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和渗透,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着两面性:全球化给我们的知识生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但同时也给我们知识的生产和文化的全球化旅行带来难得的发展契机。因此辩证地认识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的二重性可以使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一契机来发展自身的文化和批评理论。可见,他所强调的是全球化的积极方面,即承认它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而不像过去那样由指令性的号令来规定。

对此,岛村辉似乎颇有疑义。他指出:不能够以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来抹平文化上的差异。撇开东西二元对立图式不谈,仅仅局限于东亚文明内部而言,经济决定论也是偏颇的。例如,随着近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逐渐成了无法分割的合作伙伴。但是,由于历史认识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两国经济关系紧密,政治上却存在着隔阂。这种“政冷经热”状态日中双方都十分关注。照这样下去,“经热”不久将有可能由“经温”向“经冷”推移。类似包括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关系的“东亚共同体”等构想浮现了出来,这体现了经济人所发出的、期望能寻求某种方法来打破这种僵局的呼声。但是,他担心以经济为中心课题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能否一举实现。他进一步指出:如今,在文化领域也兴起了“地域化”的话题,这不能说与现在这种状况毫无关系。但是,“地域化”这个词是受一种特殊的语境所规定着的,若是无条件地引进来使用,则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首先,必须考量一下“地域化”这一概念的特质。得益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及随后的“语言学转向”,以语言学为范式的文化诸论,正在以对语言自身系统的关注和对语言与文化间的关系的关注为动力而蓬勃地展开。从“语言学范式”、“符号学理论”的广泛使用到“后现代主义”的展开,人们对种种问题的关注,可以说都是针对系统的静态或动态结构所作出的综合分析和记述。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为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引进了20世纪后半期人类所创造的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这种记述方法,在某种情况下,仿佛采取了肯定无序与混乱状态的过激手段。那么,实际上这些做法是否能对现状进行带有普遍性的阐释,还有待时日的验证。因为,在批判现状的时候,常常会导致回避当事人性的结果。有些西方学者或倾向西化的东方学者期望通过回避当事人性形成一种“普遍”的言说机制,也即一种超越语言、地域和文化框架的对话场所。然而,在整合文化道具对“个别”对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缺少语言、地域及文化的“特殊性”。当知识分子运用所谓的“现代批评”的话语来阐明问题时,都体验到其中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从而产生了“解释的忧虑”、“失语状态”、“身份认同的危机”等深刻的危机感。

可见,岛村辉的持论对小森阳一的前述观点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同样,赵京华也清楚地看到了“地域化”的“陷阱”。他指出:我们不能不看到,“地域化”中也包含着谁来“化”谁的问题,所谓“地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共同体”,对外有迎拒新帝国“全球化”的功能,在内部则包含了谁来“主导”,以谁为“中心”重新分配市场、实现经济整合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地域化”一方面有着抗拒“全球化”对世界的划一性宰割的内在动力和要素,但在结构上同时也包含着与“全球化”相似的同化异己、排斥他者的性质。当然,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以资本的流动为动力的,我们难以左右。但文化知识上的一体化包含着消除异己排斥他者的危险,对此,我们从事知识生产的人不能不给予警觉而努力回避。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的一些学者为了谋求全球化形势下新的知识对话途径提出过建立“知识共同体”的倡导。虽然倡导者们在实际的知识对话过程中是相当开放和多元的,然而仍然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共同体”无论是前现代的宗教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还是现代的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俗共同体,都有一个把人们强制性地组织成集团共同生存下去的结构系统,这已经得到了文化人类学和符号社会学的证实。这个结构系统是对于外部而言的内部,

是相对于外部混沌的内部秩序，偶尔也通过引入外部的异质者使自己的系统活性化（激活），但本质上“共同体”是排斥外部和他者的。它很难避免内部的同化和自我封闭，不利于多元化的知识创造与生产。

再次，就“全球地域化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文学”这一课题，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小森阳一指出：在迎对拒斥欧美强加给我们的东方主义的同时，亚洲，尤其是东亚内部也要走出文化客观主义，抛弃文化中心主义，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实践“交往理性”指导之下的“文化对话主义”。对话绝不能消除分歧；同样，东西方文化对话也不能削平或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非强制性的形式，换言之，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

吴定宇对小森阳一的见解表示乐观的共鸣。他从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日文化现代性发生、流变的特质，指出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同处东亚地域的中日两国学者互为借鉴、互相交流的重要性。从而引发出人们以“地域性”文化对话解构“全球化”思潮的现实思考。

王宁则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影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应这一潮流，即承认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一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只是跟着它跑。正确的态度是，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大力发展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他肯定地指出，就全球化进入中国而言，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它已经不知不觉地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生产和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研究的引进中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即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挑战。诸如网络文化、传媒文化、消费文化以及社区文化这些现象仍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有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文化研究者对此加以观照和研究。这些学者过去大多是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他们也关注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给传统的精英文化带来的影响。但他们并不主张把大众文化排斥在外，而是要从理论的视角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试图发现里面的合理因素，并且把它加以理论化。就文学经典的形成而言，任何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在一开始都是非经典的，有些一开始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化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调整，再加以新的批评理论的“重新发现”，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精英文化产品，甚至目前的网络文学也是如此。而昨日一些经典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因批评风尚的嬗变以及接受群体的不同而丧失既往的经典地位。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文学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非边缘化”道路中见出例子。总之，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文学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岛村辉基于文化防卫战略的高度恳切地发出了警示。他提醒道，运用“地域化”理论模式考虑问题时，随之出现的常常是与“全球化”和“国家主义”这两个模式的关系问题。和“全球化”相对立的，与其说是“地域化”，不如说是“国家主义”。以研究日本近代文学为例，所谓“国家主义”就是指日本或中国的学界各自为营，不展开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而只是一味墨守着各自的概念和方法。在这种方式下，彼此的学术成果不是在根本意义上的共享，所谓“交流”也只不过是少数从事跨越两国学术界工作的人们，在特殊的情况下偶尔展开的，几乎都没能产生大范围的影响。正如涉足这一领域的知识分子们长期存在的问题，尽管同样是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但彼此却没有共通的语言，至于作为研究背景的“共同的语境”，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了。另外，在共通的框架中，与“日本文学研究”、“日本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人们进行对话和交流也变得难以实现。

他认为这不单单限于日本文学，中国的英文系、中文系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寻求“现代批评”的框架，首先大概也是不满足于这种受限制的环境。然而，他们所寻求的“后现代主

义”的“普遍”言说机制，却带有前面所说及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的苦恼。“地域化”这一概念作为既非“国家主义”也非“全球化”的第三种模式，其有效性正在试验当中。

因此，他明确地指出：文学研究中的“地域化”学说可以说是一种为了缓解这种危机的构想。不过，他又警告道：一般来说，从“后现代主义”向“后殖民主义”过渡时，必须具体考察在各个场合中，要在怎样的张力下发现上述的话语系统。在考量被称为“东亚”的这一地域的“近代”历史，与各“国”或地域的历史认识时，必须常常意识到这些“国家”或地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性。即使是围绕着同一部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不单是语言上的翻译问题，各个国家或地域都有由历史形成的价值体系，如果不考虑这种固有的体系的话，就算在讨论同一个对象时能够达成“共识”，然而双方都无视对方所处的语境而满足于在自己的语境中任意解读，自然就无法达到本质意义上的、在“共同语境”下的相互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为了达到在“共同语境”下相互理解的目的，必须寻求“地域化”概念所包含的某种有效性。

对此，赵京华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分析说：在同时受到全球化和地域化潮流冲击的当今社会，文学研究和知识生产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拘守于民族国家或共同体的内部，需要面对世界潮流，通过广泛的知识对话来处理我们共同关心的文学和区域内的课题。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能够共享知识成果，互动和相互借鉴的公共知识空间，也需要打破传统比较文学的本土与外来、影响与接受的主客二元对立思考，在共同建立起来的知识平台上实现方法论的交锋与沟通。不过，他特别提到：就是区域内部的文化知识交流，既要努力消除一百来年“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话语霸权，充分开掘地域内部的思想资源，又要充分认识对方的“他者性”，要相互把对方的文化知识化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在摆脱现代民族国家构架的束缚、拓展知识对话空间的同时，也要警惕相互同化和把本国本民族“中心化”的危险。

针对如此忧虑，有些学者提出了更为切合实际的方略。

蒋述卓立足于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颇为务实的“反思论”。他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开始注重反思，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此，在“全球化”与“地域化”大潮同时冲击的情势下，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思论”。他指出，反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反思，学界召开过多次宏观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试图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而又有所回归，如有的提出返回文史哲合一的综合研究方法，有的提出文化学研究方法，有的提出回归古典文学研究对象自身问题。二是学术规范的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界首先在文学研究领域重提建立学术规范问题，表明它更加重视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规则来拓展古典文学的研究。变异表现在学者们不再一窝蜂地追求什么“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研究，方法可采纳多种，途径与结论也呈多元化格局。此时，“方法”已然退到研究的次要位置，而“创新”与“物质”上升为主要位置，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也试图有新的突破，而不再囿于“人民性”这一个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的研究目的悄然进入研究者的思想中，研究者甚感学术自由，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孟庆枢的所见非常具备学术张力。他认为，今后的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有益的理论，是促进我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界面对后现代主义显示了一种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与其对话、沟通的态势，其中的“差异性”理论，中国批评界回应了“和而不同”，而后现代主义对“元叙述”的质疑也使中国批评学拓展了空间；我们不能仅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解构”，解构的另一方面是东西文化新的整合。

见仁见智、各擅胜场。不过，饶芃子的高度概括性表述堪称就此命题的象征性总结。她提纲挈领地指出：面对“全球化”、“地域化”思潮的同时冲击，我们应该：1. 要有一种更为阔大的视野和文学观念；2. 要拓展文化的多维“对话”3. 到历史中寻求借鉴。

综上所述，举办方将本次大会主题定为“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可见其用心之良苦。总而言之，面对“全球化”与“地域化”思潮的同时冲击，我们东亚文学研究者已经逐渐有了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协同作业、共建话语、明确身份的重要性。这表明了东亚区域内一些知识分子寻求知识交流新途径的愿望。我们需要对话，需要协同作业。但是，我们的知识对话、协同作业要以多样性，以承认他者的原则为前提。“广州会议”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取得了令人期待的成果。大力促进了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形成极其深远的影响。时隔一年，我们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审查，在梳理出会上所宣读的大部分优秀论文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未能及时在该研讨会上公开发表的高质量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正式以《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前沿文存》的名称结集出版。这也算得上是近年来中日两国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界前沿科研成果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总结。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出版物无法全部容纳“广州会议”上取得的所有成果，有些重要论文已先期陆续在国内外相关刊物上与读者见面。总而言之，如此对话交流活动、出版活动今后将会继续下去。相信此举会对中日两国乃至东亚整体的文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次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该校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承办的出版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大力支持。与会代表踊跃投稿，徐真华、陈建平、饶芃子、吴定宇等多位专家还热心推荐并耐心帮助审理稿件，为出版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性意见，确保了编辑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卡西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也提供了不菲的出版经费，其诚可鉴。最终我们还得到汕头大学出版社胡开祥社长及其同仁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编者识

2006年3月30日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语言的政治，文化的政治，以及文学的政治

——在“2005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之新思路”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小森阳一

一、日俄战争与近代文学

1. “文学时代”的来临

关于森鸥外的《青年》（《昂》，1910年3月-1911年8月），前田爱曾经指出：“小泉纯一与三四郎相似，被设定为上京（上东京——译者注）寻梦的青年。但是他与三四郎完全不同的地方是，他没有体验到三四郎那样对都市空间的恐惧感。他刚到东京，就开始轻松地寻找文学老师大石路花的公寓。拿着鸥外首创的‘东京位置图’，他那稳当的步伐穿行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之间，看上去俨然一个东京本地人。”（《假象之街》，收于《都市空间之中的文学》，筑摩书房，1982年）

的确，《青年》的主人公小泉纯一是一边拿着堪称“纸上城市”（前田爱语）的“东京位置图”，一边对照现实城市和地图记载一边行走的。

手拿“东京位置图”的小泉纯一寻找大石路花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说，在第一章中小泉纯一开展活动的时间展开之同时，叙述者又以特权的形式，在第二章的开头向读者展示了正在被小泉纯一寻找的大石路花吃早餐的情景。

大石边吃东西边打开坐垫旁边的《东京新闻》，阅读登载在其第一版的小说。那正是他自己所写的。接着路花跳过其他文章，开始浏览自己负责的副刊部分。当然该副刊挤满了文学专栏。那里有四五位特约记者所写的评论，主要针对两三个被称为一流作者的作品。

大石读完了《东京新闻》的第一版和副刊之后，开始“挑读其他两三张报纸的文学栏目”。从这个叙述来看，大石至少订了四种不同的报纸。而且很明显他仅是为了阅读文学栏目，其他报道文章均被隔绝在阅读范围之外。

在以城市命名的《东京新闻》这一虚构的报纸上，本来应该只是以登载世界或者日本国内政府公报等现实事件为主的，但是在其“第一版”，却刊载着报刊小说。正是在这种报纸刊载小说的现实状况之中，小泉纯一为了拜见“文学家”大石路花，而在东京行走着、寻找着。

关于这两个发生在同一个早上同一时间跨度的平行事件的记述，昭示着明治40年代另外一个发生在“纸上城市”（指东京——译者注）中围绕着报纸媒体的决定性变化。这同时也是引发包括小泉纯一在内的报纸读者层变化的一个连锁事态。

和《三四郎》的主人公小川三四郎、或者已经上京的其他同乡青年一样，小泉纯一上东京不是为了考大学读书，也不是为了找一个有前途的工作。而是“想当诗人，想写小说”，有志成为文学家。几乎是被这种模糊的愿望所驱动，他才来到东京的。也正因为如此，最先拜访的对象才是作为“文学家”已经获取了声名的同乡大石路花这一人物。

报纸文学专栏的一个地方读者，试图成为该栏目的信息发出者而来到东京。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往昔那种上京游学与出人头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仿佛又回来了。这不仅是发生在小泉纯一一个人身上，他周围的人们都共同拥有着这种错觉。所以，颇有资产的小泉父母才答应支付独生子纯一上京的旅费，或者说他取得文学上的成功之前的生活费用。而且，纯一在大学学习的朋友们也没有对他的选择表示不解。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立志当文学家而选择上京这种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到来。

不，也许更确切的说法是：日俄战争之前的错觉在这个时代成为了现实。从1897年1月开始，《万朝报》就已经在悬赏征求报刊小说。《读卖新闻》挟1894年4月产生了在校学生高山樗牛以《龙口入道》获得二等奖的神话，聘坪内逍遙、幸田露伴为评委，征集短篇小说或独幕戏剧。1904年1月，《大阪朝日新闻》以奖金300日元征稿小说，第一届入选者是近卫师团佐仓连队步兵军曹大仓桃郎。其笔名“黑风白雨樱主人”不但无法与真人相联系，而且他由于出征在外，以至延迟领奖，颇有新闻效果。获奖作品《琵琶歌》引起了狂热的反响，而他负伤回国之后便担任《万朝报》记者，开始执笔专门撰写报刊小说。那时名列第二的《长恨》的作者是京都铁道社员大阪里三郎。在另外一次征文大奖赛中再次入选，成了他1908年进入《大阪朝日新闻》的重要契机。

1906年《东京朝日新闻》也以奖金300日元募集小说，而《大阪朝日》则在同年末以总额为2500日元的奖金征求原创剧本，其他报社也纷纷模仿。可以说这是明治40年代席卷了整个报纸媒体的大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小泉纯一模糊的愿望虽然有着一举成名的投机心理，但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现实性。

2. 报纸的角色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的报纸印象是：所谓的“大报”主要以政论消息为主，读者层是上流社会有经济实力的人士。而“小报”则有假名注音，大多是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刺激性的各界丑闻，主要面对下层社会的读者。

但是，在甲午战争的报道竞争和围绕着三国干涉的民族主义统一论调之中，“大报”的作用被削弱，而“小报”的发行量却节节拔高。恰如正冈子规向夏目金之助坦言那样，《日本》销路停滞，“发行量降至在1万份之下”，是明治30年代初的事情。也就意味着“小报”称霸的局面应该大致完成于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前后。

山本武利指出：该时期的报界是“大阪报纸进入信息报纸时代”，“东京则是社会报纸、信息报纸、家庭报纸三雄鼎立”，“言论报纸、独立报纸开始走向衰退”。（《报纸记者的诞生——创造日本媒体的人们》，新潮社，1990年，图表也出自该书。）

此局面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年6月末展开的关于日俄之间应该开战还是非战的激烈论争。《大阪朝日》、《东京朝日》提倡最强硬的主战论，《时事新报》、《大阪每日》、《国民新闻》等也主张开战。站在非战立场上的是伊藤博文派的《东京日日》、岛田三郎的《每日新闻》、秋山定辅的《二六新报》、黑岩泪香的《万朝报》。不过，当年10月8日，《万朝报》最终还是从非战论转向了开战论。为了表示对泪香的“战争不可避免”宣言的抗议，同日，幸德秋水和堺枯川在由社会主义协会于神田基督教会馆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反战大会”上，宣布退出《万朝报》。10月13日内村鉴三也退出《万朝报》。10月12日的《万朝报》上刊载了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退社辞》。

围绕着战或不战以及《万朝报》的转向，报纸这一媒体被商业化的宿命显现得如此清

晰。本应是表达复杂的外交与内政理念的“政论”，被置换成了开战还是非战的简单图式。再加上自三国干涉之后被媒体哺育起来的扭曲的民族主义口号，开战论者以政府批判方式，巧妙地充当了貌似反权力斗士的角色。这时，由媒体煽动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遮蔽了“名目上是日俄冲突，实质上是两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内村鉴三：《万朝报》，1903年9月4日）的本质认识。

像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堺桔川这些资深记者那样以“政论”纵横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此意义上，这些被迫让位给小报的大报论客们，可以说是被民族主义情绪从商业媒体的舞台上驱逐了下去。在这个时代，作为一种生意，当报纸经营方面发生凌驾于“政论”理念之上的事件时，大报便会消失，而小报将生存下去。《万朝报》曾经是六位数的发行量，但在刚才涉及到的图表之中已经降到了五位数（尽管时间是转向一个半月之后）。这比任何东西都能反映黑岩泪香作出决定时的外部情况。提倡非战论的《二六新报》遭遇了同样的难局。日俄战争前，社长秋山定辅被怀疑是俄军间谍，1903年还是24余万份的发行量，到1904年夏天猛跌了10余万。本来以社会热点、犯罪、丑闻等刺激性报道以及权力批判获取了大量下层读者的《万朝报》和《二六新报》，却在民族主义支配的日俄战争的报道竞争之中，败下了阵来。

换言之，根据《青年》的叙述，通过迎合战争民族主义，曾经是“小报”或“独立报纸”的东西，诸如《朝日》、《时事》、《国民》等开始强大了起来。于是，“小报”也开始“提高品位”，摒弃像日俄战争前《万朝报》那样“随记者改变做法”，“偶然有新思想的记者入社”，故“偶然地获取了学生之类的读者”的理念，迎合在战争报道中造就的占大多数的新读者层，在新闻版面不断填充能够满足他们的报道。日俄战争之后，所有报纸的文章均被战争报道这一形式统一化了，之前的那种由记者的魅力自然或偶然地营造读者层的事情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偶然”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在这种时代，社长的经营方针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新社长”的方针是网罗“帝国大学所有学科的一流教授”，试图聘请他们为“特别赞助员”。这是基于报纸将会学问化之预测而采取的措施。这个虚构的社长所提出的关于日俄战争之后的经营方针，不仅会让人想起当时《读卖新闻》主笔竹越与三郎的路线，而且恐怕也与日俄战争前的开战—非战论争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在商业媒体上宣扬开战论的正是帝国大学的七位博士。这个情报首先被非战派的《二六新报》披露，然后《东京新闻》全文刊载了这封由七位帝国大学博士撰写、寄给首相呼吁对俄开战的信件。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特讯是当局故意泄露的情报。

1903年6月10日，东京帝国大学以户水宽人、富井政章为首的七名教授访问桂太郎首相，提交了主张对俄开战的意见书。他们认为俄罗斯“占领‘满州’之后覬覦朝鲜之企图已洞若观火，朝鲜若屈服于俄势力，紧接下来面临危险的是谁已不言自明”，所以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先取朝鲜，而夺取朝鲜则要先取“满州”——这种逻辑一直支撑着此后直至二战为止的“北进论”思想。

当时，帝大七博士并没有公开发表该意见书的意愿。但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政府泄露，遂成为《二六新报》的特讯。虽然报道出来的内容和实际信件已有较大出入，却依然引起了公众的狂热反响。6月24日，《东京朝日》一举刊登了全文，紧接着《大阪朝日》分25、26日连载了该信。这时，《东京朝日》的新闻已经成为中心。就像原敬回想的一样，“先让七位博士提出讨伐俄国的论调”（《原敬日记》）。政府方面的主战派，已经在东京帝国大学形成。这是一起通过商业媒体，利用学院权威来操纵舆论的事件。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学院派是在日俄战争的民族主义潮流中形成的。

另外，“少壮派政治家般的铁腕”、“在某大国外交团锻炼过来的本领”、“肥胖的身体裹

着巴黎最新款的男士礼服”——《青年》之中对《东京新闻》的“新社长与田”的描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日俄开战时大展政治身手的《东京朝日》主笔池边三山。

三山从1892年开始担任一个旧藩主后人的辅导教师，在巴黎居住了八年。当时他已是陆羯南的《日本新闻》的特约撰稿人，并以“铁昆仑”的笔名撰写“巴黎通讯”专栏，捕捉欧洲对甲午战争的反响，而且预言了开战之后两个月的三国干涉事件。另外，“巴黎通讯”的撰写同时也成了他对欧洲各报纸的比较研究。归国后第二年，三山以《大阪朝日》主笔的身份入社，之后不断发表主要社论。他在1903年4月23日收到中俄关于“满洲”之密约的快电，便立刻拜见首相桂太郎，直言必须对俄采取强硬措施。从此，三山的社论开始宣扬坚决的开战论，成为了媒体开战论的急先锋。

池边三山不仅只是提倡主战论。除了与桂太郎首相直接交涉，通过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二元老间接或直接的接触，来稳步推进开战的步伐之外，他还密切接触外务省亚洲局长山座円次郎、参谋本部次长儿玉源太郎，从而给《东京新闻》搜集了大量的珍贵信息，同时信息也流向《大阪朝日》，两报机敏有力的社论方才得以出现。

1903年9月30日，三山受外务省参次官坂田重次郎之托，到京都南禅寺无邻庵去游说山县有朋鼓动战争。催促山县开战之后，马上于10月1日会见《大阪朝日》的高层，开始布置构建日俄开战后的报道体制。10月7日即制定了《战时通讯任务规定》、《战时通讯员补贴规定》、《战时通讯员赏恤规程》——开战前一年，报社内部的临战体制就已经建立了。1904年1月25日，三山从儿玉参谋长那里获得至开战前的日程信息，于是报社马上决定配置陆军随军记者，架设能直接联系广岛大本营的特别电话。

如上文所述，当时年当40的池边三山在日俄开战之际，的确是以“少壮派政治家般的铁腕”、“有方向性的意志力”活跃于报界政界之中。如此看来，以下两件事情就有了共同之处：日俄战争之后，由《读卖新闻》的竹越与三郎提议、西园寺公望举办的“文士招待”在“一夜之间，揽一代名士于华族会馆食堂”；日俄战争前一年的11月10日，共250名的众议员、实业家、记者汇聚于帝国酒店，举行了“时局问题联合恳亲会”，决定要求当局采取开战的“果断措施”。也许像池边三山般既是记者又是政治家的类型是最后一个人了。因为他所构建的日俄战争报道体制催生了忠实于大本营的“记者俱乐部”（现在依然存在），并把报纸从“政论”和丑闻中心的编辑切换到了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方向，而且，他通过文学手段应对战争后之报道危机的方针创立了“文学的时代”。日俄战争之后，报纸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政论家”，而是能带来特讯这种商品的新闻记者，以及即使没新闻也会制造出新闻的报刊小说写手。

3. 商品化的文学

池边三山能给报纸这一媒体带来决定性改变的最大理由是，透彻研究过欧洲报纸的他明确意识到语言信息是一种商品。三山在1896年12月9日写给《大阪朝日新闻》的《入社辞》中，用了“言职”（以言论为职业之意）这一题目。

……所有新闻记者均被社会赋予了言职之使命。新闻记者勤于言论与农民勤于耕耘、市民勤于生意、工匠勤于制作毫无区别。（中略）吾人言论若能与寻常农产品、工业品相提并论，实乃大幸之极。

如果说仍然依恋自由民权运动的报人怀有着“无冕之王”、“社会警钟”等经世济民的强烈精英意识的话，那么三山则彻底抛弃了此类感觉，宣告言论与农产品或工业品等商品完全等价。可以说三山始终贯彻了这样的观念：言论只有出售给读者即买方才能成为商品，否则无论多么高尚的议论都没有价值。

在日俄战争报道之中，各报社都派遣了特派记者，原料和生产手段是一样的。为了提高商品价值，只有提高各工序的生产速度。要依靠信息商品的新奇度来决定胜负。信息通过电报输送回来，迅即跃然纸上。像甲午战争时期那样充满文学描写、煽情的文体已失去市场。“我鱼雷击沉俄战舰二艘、巡洋舰一艘”——旅顺海战的第一报道于9日晚上11点8分发回，旋即被登载在翌日的《东京朝日》的预定排版栏之外的临时栏目，并成了特大新闻。英国的《伦敦泰晤士报》包租了无线通讯船“海门号”以谋求高速通讯。仿佛是与其呼应般，《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柴原龟二也策划了该社的特制通讯船“繁荣号”，欲图利用其来进行战况的实况报道。虽然该船在赴旅顺途中被击沉，但从中可明显看出，当时的快速报道制度是如何被彻底贯彻的。

作为特派记者赴当地采访的新闻小说家半井桃水获得名声并不是由于其文章，而是因为《水师营会见》这一独家新闻，以及围绕该新闻的若干图片。拍摄于1905年1月5日的该照片登载在1月19日的《东京朝日》上。硬派社论记者的时代结束了，软派的现场报道记者开始粉墨登场……

通过社论记者内藤湖南的介绍，1904年（43岁）3月进入《大阪朝日》的长谷川辰之助便是无法适应报纸这一变化的记者之一。他的工作是利用自己的俄语才能翻译俄国的新闻报道或其他信息。但在日俄战争后的硬派社论已如明日黄花，报社经营每况愈下，各元老纷纷被迫辞职，长谷川辰之助的退社问题也被报社提上了议论日程。

池边三山从中斡旋，消除了这一危机，但作为补偿，他通过弓削田精一向辰之助提出了撰写商业式报刊小说的要求。但是辰之助一直对自己成为写报刊小说的二叶亭四迷（长谷川辰之助的笔名——译者注）心怀抗拒。据弓削田回忆，辰之助曾对他含泪说道：“我感到无比遗憾，世人仅视我为一小说家，而你竟也是其中一人。”辰之助正是仍然坚信“硬派记者”价值、却已被时代抛弃的男人之象征。

但是，在弓削田的再三劝说之下，辰之助最终还是返回了写报刊小说的通俗作家二叶亭四迷的名号之下。于是便诞生了《其面影》（1906年10月10日-12月31日）。虽然当初以日俄战争后的寡妇问题为主题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该作突破了之前《朝日新闻》以刊登通俗家庭小说为主的框框，成为了朝日报刊小说确立“纯文学”路线的契机。

就在《其面影》连载期间，《朝日新闻》也开始打起了夏目金之助的主意。最初注意夏目金之助的是《大阪朝日》的首脑之一岛居素川。被《草枕》所感动的他于1907年新年来向“漱石”提出了随笔的稿约。与此同时，《读卖新闻》也以月薪60日元邀请“漱石”负责文坛专栏的写作。当时有消息说漱石将在元旦那期《读卖新闻》上开始推出“作品批评”的专栏，并出任其“特别撰稿人”。这时，池边三山出动了。三山已经对日俄战争之后如何抓住新的读者市场有了明瞭的构思。到日俄战争前，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超过90%，中学生超过10万人。高中也开设第八所，帝国大学准备在东京、京都之外再增设东北、九州等分校。文部省从1903年开始允许私立专业学校改称大学。抓住这些知识读者阶层，或者说大众化、市场化的知识分子才是报纸经营战略的基本方针。三山开始考虑社会版面和小说栏目的改革。与战争前已经确定的传统小说、现代小说的二元格局之外，他试图树立作为第三支柱的西欧文学即纯文学小说以及其写作阵容。在刚刚进入朝日新闻的涉川玄耳和白仁三郎——夏目金之助在熊本时代的知己——的协助下，三山向大阪的高层提交了欲聘请“漱石”的信函。

白仁直接与夏目金之助交涉，弓削田精一开出了《东京朝日》方的条件。在这种斡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夏目金之助已清楚意识到文学既是商品了。

1907年3月11日金之助寄给白仁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一切文学作品”均由《朝日新闻》刊载；第二，“分量种类长短以及时间分配”皆是作者自由；第三，报酬是“月薪200日元”，并且希望与普通员工一样，享受报社一年之中相当于四个月工资的节日福利；第四，